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文化条件

中国共产党是伴随着中国先进文化的产生而建立的。1915 年的新文化运动和 1919 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历史由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两次伟大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这两次思想文化解放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使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与先进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而这两次思想文化解放运动的发生和进一步深化,标志着现代中国初期先进文化的产生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文化条件的成熟。

一、现代中国初期先进文化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现代中国初期先进文化之所以在中国由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中产生,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外敌的入侵和内政外交的腐败引起革命斗争风起云涌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社会,是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历史时期。外敌的入侵和内政外交的腐败,以及风起云涌的人民革命斗争,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

早在明代中叶,中国就已经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



会。然而,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正常转变的历史命运。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口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沙俄对中国东北和新疆地区的强行割占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经济上,一方面封建地主经济不仅依然保持,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一起,对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另一方面,帝国主义操纵着中国的财政,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使中国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原材料供应基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原本就十分脆弱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本国封建经济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压迫下,举步维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依然处于十分落后的境地。在政治上,地主阶级和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封建军阀官僚集团的联合统治,代替了封建皇帝的统治。由于帝国主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而且插手和干预着中国的军事,中国对外毫无国家主权可言。从阶级构成和阶级关系看,在原有的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先后出现了一些新的阶级,如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样的历史条件,必然决定着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革命的主要任务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贫苦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演变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其中,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中国革命的任务,则由过去的农民群众反对地主阶级的统治,变成了人民大众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

在整个近代中国 and 现代中国初期,各派统治势力的腐败程度达到历史的高峰。满清王朝对外投降卖国,对内严厉镇压人民的反抗。即使是人民自发地反抗外国侵略者的爱国斗争,如“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也遭受到清王朝的残酷镇压。以清王朝鹰犬袁世凯为代表的北

洋军阀篡夺辛亥革命成果之后,一方面对革命党人施行政治欺骗和武力镇压,另一方面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下扮演了一出“称帝”的丑剧。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中国由一个统一的军阀统治变为由各个不同派别军阀的割据。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和操纵的状态,各派政治军事势力长期频于内战,企图争夺中国的最高统治权。在这种状况下,中国人民不仅生活极度贫困,而且政治上的不自由程度也为世界所少有。

面对外敌的入侵和统治集团内政外交的严重腐败,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有两次。一次是1851年至1864年由洪秀全等人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这次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斗争,坚持了长达14年的时间,波及全国18个省,是中国历史上尤其是中国近代以来声势最为浩大的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的农民革命运动。这次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动摇了满清王朝在中国统治的根基。另一次是1911年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这是一次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主要力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尽管这两次大规模的革命斗争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它们都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未能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但是,这两次大规模革命斗争以及后来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军阀割据的一系列斗争,使人民革命和民主共和思想逐步深入人心,引发了人们的思考,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的人民革命斗争的到来,起到了极大的思想“启蒙”作用。

(二)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严重的尊孔复古逆流

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窃国之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他们宣扬帝王思想,主张君主立宪,甚至公开下令祭天祀孔,尊孔读经,提倡



蒙昧主义。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曾极力怂恿袁世凯实行帝制，一些外国反动文人也纷纷撰文，认定中国“民智低下”，只能行“君主”之制，不能建“共和”之国。国内一些复古思想严重的文人也为之推波助澜，尤其以杨度（后来在周恩来等人帮助下转变成成为共产党员）为首的所谓“六君子”和梁士诒等人最为活跃。杨度等人组成的“筹安会”，与梁士诒等人组织的“全国请愿联合会”一唱一和，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造舆论。他们指责“富强、立宪之无望，皆由于共和”，主张“今欲救亡，先去共和”，鼓吹“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①竭力充当袁世凯的“御用”文人，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在“戊戌维新”时期就曾经宣扬孔学，力图从孔子“改制”思想中寻找维新改良依据的康有为和梁启超，虽然没有为袁世凯称帝直接助威，梁启超还参加了策动蔡锷组织反袁护国军以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活动，但是，他们尊孔复古的思想意识依然根深蒂固。一方面，他们是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们在辛亥革命以前主张维新改良，力图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在改良运动失败，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在中国展开以后，仍极力鼓吹改良，主张君主立宪，反对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起了开历史倒车的作用。1905年，清政府颁布“预备立宪”，以欺骗人民群众。1907年康有为在北美洲宣布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后又改为“帝国宪政会”，提出“尊重皇室，扩张民权”的主张，并宣布推光绪之弟醇亲王载沣为总裁。同年夏天，梁启超在日本东京成立“政闻社”，发表《政闻社宣言书》，其立宪态度在宣言书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乱治安之举。”^②辛亥革命后，康有为组织孔教并自任会长，极力反对共和，1917年又与

① 《东方杂志》第十二卷第十号。

② 《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6页。

张勋等共同策划清帝复辟。梁启超曾任袁世凯的司法总长，在一段时期拥护过袁世凯。袁世凯倒台后，又组织研究系，与段祺瑞合作，被聘为财政总长。他在思想文化领域与康有为一样，继续推崇孔孟思想，反对“打倒孔家店”，极力抵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辛亥革命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尊孔复古逆流，与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文学复古运动，有着很大的区别。其中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以往的文学复古运动，目的是为了恢复和发扬古代文学尚实、尚用和刚峻清新的豪放文风，反对现实中存在的刻意雕凿的柔靡文风，具有其进步的历史作用；而辛亥革命以后思想文化领域中出现的尊孔复古逆流，目的在于禁锢人们的思想，以达到政治上的复古倒退，因而具有阻碍历史进步的反动性质。不抵制、批判这种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尊孔复古逆流，代表社会进步的先进文化思想就不可能得以产生和发展。

（三）外国先进文化思想的不断传入

近代以后，随着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外国文化思想输入中国的进程加快。尽管这些文化大多带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性质，但相对于中国封建文化先进得多的资本主义文化思想，如社会进化思想和政党思想的输入，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新的文化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有的外国先进文化，如科学技术，尤其是稍后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当时中国亟待用以改变其落后经济政治面貌的先进的和革命的文化思想。

近代时期最先传入中国的，是西方资产阶级先进的科技和文化思想。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统治阶级内部“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于1840年到广州接替邓廷桢为两广总督后，为了对付英国侵略，“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①，自编《四洲志》。林则徐遭流放后，将《四洲志》交给魏源。魏源在此书的基础上于1842年9

① 阙勋吾：《简明历史词典》，河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161页。



月编成并出版了《海国图志》。这部书的中心思想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用魏源的话说就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①当时魏源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主要的还不是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而是着重于科学技术,即“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②换句话说,就是西方的“船坚炮利”。这以后,“西学”逐步形成热潮,翻译出版事业应运而生。1868年6月,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局在著名学者徐寿的倡导和华蘅芳的响应下,专门成立了翻译馆,该馆成为中国第一代翻译出版机构。到1907年,这个翻译馆刊行的各种译本达199种之多,销售约6万部,超过16万册,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一时期,在中国的一些学堂中,出现了“洋人”教师。如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等,就聘请了洋人任教。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中,中美文化交流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869年,在接受了美国农业部特使查尔斯·波斯顿上校带来的美国谷物、蔬菜和豆类的种子,以及一些农业、机械、矿业等书籍图纸后,应美国政府的要求,中国政府在婉言拒绝美方提出的要求提供人口和税收资料的同时,精心挑选了10种书籍,全部为15~19世纪雕版印刷的经典著作和科学论著,共130套,934册(卷),通过海路运抵美国,藏入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每套书都标有相同的题词:“赠美国政府——中国皇帝,1869年6月。”^③此外,在中国近代,出现了一批研究和传播日本文化的中国著名学者。一位是黄遵宪。1894年,黄遵宪经过四易其稿的《日本国志》在广州刊行。这是一部长达40卷的巨著,它分别叙述了日本古往今来各方面的情况,尤其是明治维新后发生的巨大变化,是近代中国人所撰写的最完善的一

① 《〈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上,第207页。

② 魏源:《海国图志》卷二。

③ 葛建一:《中国皇帝的赠书》,《中外文化交流史话》,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页。

部日本史。在这部著作中,黄遵宪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分析和研究日本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时期的历史,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作了精辟的评论。《日本国志》问世以后,在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使当时的中国人眼界为之一开。康有为、光绪帝等一些主张维新的人士都详细地读过此书,对中国的戊戌变法起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此外,黄遵宪还写有另一研究日本的巨著《日本杂事诗》,其中包含反映日本山川景色、风土人情、文化教育和中日文化交流的诗歌200首。与黄遵宪同时期的,还有王韬东访日本时写的散文体日记《扶桑游记》。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对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1896年,他在上海创办《时务报》,辟有译书专栏,请日本人翻译日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专著。1897年,他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该年即出书10余种,其中包括《日本书目志》4册。1898年因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长达14年的时间中,一方面从事政治活动,另一方面继续介绍、传播西方和日本的资产阶级文化。他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广泛介绍西方和日本的各种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人物,尤其主张国人通过了解日本去了解西方情况,因而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对日本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传播,不仅启迪了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而且也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进一步传入,西方资产阶级政党观念也逐步传入中国。洋务运动时期,清统治集团中就有人开始介绍西方政党和议院。清朝首任出使英法的使臣郭嵩焘说:“法人君党凡三,民党亦三,议论视他国犹繁。”^①并说英国议会使“君与民交相维系”,是英国久盛不衰的“立国之本。”^②薛福成则更为明确地说明

① 《养知书屋文集》第十二卷。

②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第407页。



了西方的政党政治：“英国上下议院，有公保两党，迭为进退，互相维制”，“两党胜负之数，视宰相为转移。”^①随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更是极力把立宪政治与政党政治联系在一起，说：“政党与立宪政治，犹如鸟有双翼。非有立宪之政，则政党不能兴；若立宪之政，无政党兴起，亦犹鸟之无翼耳。”^②由于在长期封建统治下人们对“党祸”心有余悸，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均不便将自己的组织称为“党”，而只能曰“会”。但在实际上，这个“会”，已经或多或少地包含着一些“政党”的成分。正是由于西方政党观念的传入，不仅影响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成立，而且在民国初年的1913年形成了一个多党角逐于“第一届国会”的局面。尽管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使得中国不可能走西方资产阶级多党政治的道路，但政党观念毕竟从此开始为中国人所接受。既然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在中国行不通，这就必然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政治留下了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传入中国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开始作为一种学派被一些中外学者介绍到中国。1899年英国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学说。以后，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和其他一些学者都曾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过某些介绍。尽管梁启超后来抵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但他却是中国人中第一个从学术角度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在马克思逝世后近20年，即1902年，他在《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一文中指出：“麦喀士（日耳曼国社会主义之泰斗也）。”^③1903年2月16日出版的《译书汇编》，登载了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指出：“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

① 《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

② 《时务报》第十七期。

③ 《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0页。

历史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就是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1905年的《民报》第2号,刊登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朱执信的文章《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此文成为中国人中第一次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和较多地介绍他们的学说的文章。1912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演说时,称赞马克思“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议论矣。”^①此外,还有“戴季陶先生,虽然他首先以马克思主义来探求‘中国之乱源’,胡汉民先生,虽然他首先以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中国上古(战国)的哲学思想;然而现在他们早已公开的抛弃唯物史观。”^②可见,在中国首先但多为不自觉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不是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那一批人,而主要是资产阶级的维新派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派。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够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性质。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在中国,“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③有的人甚至是带着无政府主义观点和反社会主义的观点来谈论和看待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学说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步传播,毕竟为后来中国更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宣传马克思主义,起了一个开辟先河的作用。

(四)国内先进经济政治力量的发展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出现的三个新的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只有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代表中国先进经济政治力量的阶级。

①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06页。

② 《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0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



19世纪70年代,继买办资产阶级之后,中国出现了另一个资产阶级阶层,那就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买办资本主义的排挤和压制,到1911年,全国民族资本创办的投资上万元的厂矿还只有500家,资本仅为1.2亿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侵略战争而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因而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发展机会。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买办经济和封建经济始终占据着绝对的优势,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基础则非常脆弱,它在资本、设备等方面既要依靠帝国主义,又要受到帝国主义的严重压迫和控制。此外,民族资本主义对本国封建主义也是保持着一种既矛盾又依赖的关系。这就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既具进步性而又十分软弱的阶级,它的经济发展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形式,它的政治力量也始终未能达到能够独立地担负起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重任的程度。此外,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又分为上层和中下层。它的上层相对于中下层,其革命性更弱一些,而其对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妥协性则更强一些。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也迅速成长壮大起来。中国无产阶级最早出现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办的企业中,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一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一些。1913年,中国有产业工人65万,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无产阶级队伍已经发展到200万人左右。中国无产阶级有着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此外,中国无产阶级还有自身特殊的优点,即高度集中于一些交通比较发达的大中城市,便于形成强大的力量;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三重压迫,过着极度贫困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痛苦生活,因而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得特别坚决和彻

底：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大都来自破产的农民，因而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便于与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正是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的这些特殊的优点，使得其在以后的斗争中，除个别工贼外，整个阶级都是革命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产生的这两大阶级力量，前者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成为中国社会前进的推动力量；而后者则是始终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它为新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文化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二、现代中国初期先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1919年之所以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和现代历史的分界线，是由于产生了以1919年“五四”运动命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它包括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这两次中国历史由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伟大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展现了现代中国先进文化在初期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新文化运动的发生

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传入以及国内先进经济政治力量的发展，在中国社会由近代向现代转变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一批具有新的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在“万马齐喑”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充当主将的，是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陈独秀、李大钊以及后来被毛泽东赞誉为“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①的鲁迅等人。而最早在中国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是陈独秀。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创刊，标志着这一运动的兴起。以后，他以《新青年》为主要阵

^①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猛烈抨击中国的封建旧文化思想,成为当时新思潮的代表。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主要倡导者,1916年他从日本回国后,担任北京《晨钟报》主编,并积极为《新青年》撰稿,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杂文和短篇小说,其中《狂人日记》和《药》等犹如投向封建黑暗社会的“投枪”和“匕首”,激励了许多青年人加入到反封建的斗争行列,对于推动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此外,参加新文化运动的还有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人。当时还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和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也热烈地拥护并积极参与了这一运动。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一是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赞赏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提倡国民不分贵贱一律自由平等,在思想道德上反对封建旧礼教、旧道德,反对尊孔复古。二是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要求用科学法则和理性来判断一切,反对迷信、愚昧和盲从。三是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反对封建文学和僵死的文言文,提倡文学革命,要求建立民主主义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提倡新鲜活泼的白话文。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创刊号《敬告青年》中,高度评价民主和科学。他说:“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之下,若车舟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①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生则自由亡。”^②

1915年的前期新文化运动,其性质还没有能够超越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它的倡导者们还没有能够把这一运动直接引向反对帝国

① 《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

②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页。

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它所提倡的基本上还是在中国行不通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道路。但是,这一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主义,启发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激起了人们追求真理的热情和愿望,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第一次空前深刻的思想文化的解放运动。它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且也为即将到来的“五四”爱国运动做好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准备。

(二)十月革命的爆发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正确传播

1917年11月7日爆发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得到正确的传播。中国人中最先接触到十月革命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一批在俄华工。他们不仅亲眼目睹了十月革命的发生和胜利,许多人还亲自参加了十月革命和捍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到1918年5月,大约有4万名在俄国的华工陆续回国,他们带回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详细消息和真实情况。这对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和向往社会主义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自觉接受并正确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他在1918年7月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是第一篇向中国人民介绍和歌颂十月革命的文章。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各帝国主义国家和北洋军阀政府大肆宣扬所谓“公理战胜强权的胜利”的时候,李大钊在天安门群众集会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讲,这一演讲与他的另一篇著名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同时刊登于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他指出:欧战的结果,绝不是哪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胜利,而“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随后,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也开始接受和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知识分子。



(三)“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

1919年初,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1919年1月18日,27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处理战后的世界问题。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也派出了陆徵祥、顾维钧、施肇基等人代表参加了这次和会。中国代表在全国舆论压力下,在会上提出了取消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特权的七项希望条件,即放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撤销外国邮政电报机关;取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同时要求取消日本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要求归还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项权益等。由于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在4月下旬的会议讨论中,中国政府的这些正当要求被完全否决,会议还悍然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转交给日本。对此,北洋军阀政府仍然指使其参会代表准备签字接受。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进一步激化了由来已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五四”爱国运动由此发端。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工业专门学校、农业学校、朝阳大学、汇文大学等13所大专学校以及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学生共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学生们手执写有“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等内容的各种旗帜和标语,有的还绘有山东地图及各种漫画。他们不断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誓死争回青岛”、“抵制日货”等口号,要求惩办北洋政府亲日派官僚即签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时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和原驻日公使、时任币制局总裁的陆宗輿。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大肆逮捕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5月5日,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学生全部罢课。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成立学生联合会。6月3日,北京各校2000多名学生涌上街头开展大规模的反帝爱国宣传活动,被北洋政府军警逮捕数百名。北京的“五

四”爱国运动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学生和各界爱国群众的响应和支持。当天,上海工人阶级开始举行声援北京学生反帝爱国斗争的“六·三”政治大罢工。到6月5日,上海工人阶级参加罢工的达15万人以上。上海商人也在学生和工人斗争的影响下,举行了罢市斗争。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相继出现了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和学生罢课的“三罢”联合斗争局面。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6月28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从而给这场运动画上了一个胜利的句号。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觉悟,锻炼和造就出一批献身于中国解放事业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它既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同时也是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发展的一个崭新的阶段。

(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

“五四”爱国运动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在前期新文化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新青年》,在“五四”运动以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宣传阵地。1919年5月,在李大钊的主编下,《新青年》辟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了李大钊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向中国人民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李大钊已经完成向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转变。与此同时,李大钊还主编了《每周评论》、《少年中国》,并帮助指导其他一些刊物,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潮。“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也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1919年12月,他在《新青



年》上发表由他执笔的《本志宣言》，确定了《新青年》的社会主义方向。1920年9月，他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①表明了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革命立场，对推动大批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起了重要的作用。1919年7月，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发表了他早期的重要论文《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宣传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年底，他到北京精心研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由此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7月，他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经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新青年》、《劳动界》等反映新思潮的书籍报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19年9月，周恩来等人在天津发起组织“觉悟社”，出版《觉悟》杂志，把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探讨改造中国现实问题，作为“觉悟社”的一项重要任务，并在这些工作中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任务。

“五四”运动以后，全国有200多种报刊，在不同程度上介绍了十月革命和宣传了社会主义。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以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也在中国陆续翻译出版。1920年4月陈望道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是中国最早的完整中文译本。接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国家与革命》等译著相继出版。这些宣传，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民中间广为流传，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而且表明现代中国初期先进文化发展到“五四”时期，已经在实际上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① 《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三、现代中国初期先进文化形成发展的特点

纵观现代中国初期先进文化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看到其如下的一些特点：

（一）鲜明的反封建意识

现代中国初期先进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其鲜明的反封建意识。前期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和迷信以及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主张，表现出新文化运动与以往一切文化革新运动的本质区别：把文化运动与社会革命运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把民主和科学并重，更是以往的文化革新运动倡导者们所没有涉及过的。如上所述，民主和科学两词，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输入中国的“舶来品”。民主在英文中读“democracy”，音译成汉语为“德莫克拉西”；科学在英文中读“science”，音译成汉语为“赛因斯”。它们是西方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两大成果。民主是对专制而言，科学是对愚昧和迷信而言。中国前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识到：中国之所以总是被西方列强侵略，是因为中国大大落后于西方强国。而中国之所以落后，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政治制度腐败。西方国家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强大起来，是因为西方国家广泛开展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推翻了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解放了生产力，从而为大大优于封建经济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严重地禁锢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自由和人身自由。在人民群众没有思想自由和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以“人”为最重要因素的生产力是难以解放和发展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的科学文化落后。英国之所以在19世纪中期能够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除了其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之外，这一时期它的科学技术也